# 洞穴寓言与哲学家的政治责任\*

李凌浩 20181052113

在洞穴隐喻中，柏拉图试图通过一个被“遮蔽”的世界来反衬那真正“是”的世界。在洞穴中被绑缚着成长的人，只能看到火光投射的影子——不是“是”本身而是“是”的映像[[1]](#footnote-1)。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可能将山洞之外的景象当作虚幻而将洞穴中的投影视为真实世界，而能够摆脱洞穴中的映像拥抱太阳（真实之因）的人，也就不愿再回到原来的山洞中了，即使愿意，也会被从前和他一道观看投影的人当作异类。洞穴隐喻是另一个对现实生活的比喻，被绑缚者即使有观察和思考的天性，也无法接近“是”或者“真”，只有被解除了山洞生活束缚的人，才有可能过上哲学的生活。柏拉图用山洞譬喻城邦的现实，对第六卷提到的思辨思维的上升性和第一性作出了解释，并解释由可见世界到思辨世界的转换和“上升”（517b）。这种上升性和第一性带来的问题是，它让哲学家在具备统治城邦的资格的同时，也排斥世俗的、在下的、“低等”的生活，“走向那些被捆绑的人，分有不论是这些人的苦难或是他们的荣誉、而不论这（荣誉或苦难）是一些低劣的还是高尚的”（519d-519e）。

一、洞穴寓言的几个阶段

*1. 洞穴世界的构成（541a-515c）*

*2. 从洞穴世界上升到洞外世界（515c-516c）*

*3. 从洞外世界回到洞穴世界（516c-518b）*

一个幽暗而狭长的通道连接着洞口和洞穴内部，洞穴内有一个篝火和一些能够自由行动的人，火光将他们的影子倒映在石墙上。一些人被绑缚手脚、面对石墙从小生活在洞穴中。苏格拉底将善的形式比作洞穴外的世界（517c），强调洞穴生活的虚假（或者相对洞外世界的“下等”），尽管在从小就面对石墙的那些人之中，可能有天资聪颖者，能够从墙壁影子的变化中发现规律，并由此得到称赞和赞誉，但也是“来自人间的扰攘”（517e）。

而洞外世界对洞内世界的超越，来自于“善”和“思辨”在形式和认知领域中的第一性。从洞内向洞外的转向，就是人在可见世界和思维世界中把握善和理智、真理的过程，柏拉图称为“上升之路”。洞穴寓言整合了第六卷对善的“太阳喻”和对思维的“线段喻”，而洞外世界对洞内世界的超越同样来自于此：一方面，善像可见世界的太阳一样，散发日光为可见世界提供存在的条件，善的形式在思维世界里为可知事物（“是”）提供原因（509b）；一方面，思辨方法在思维世界中通过假设把握本原，在认识中属于最高等级（509c-511e）。柏拉图将二者在从洞内到洞外的“上升之路”中做了统合，并将洞外世界的超越性看作洞穴寓言中一个预先构建出来的东西。最后，尽管洞内世界、墙上的倒影也有“是”和“存在”的成分，被隔绝了日光的洞内世界中的人是永远无法发现它的本原的，只有不断向洞外攀升，才有可能见到太阳（善、“是”的原因），摆脱洞内的蒙昧状态。

另一个重要的过程，是从洞外世界“下到”到洞内世界。柏拉图并不认为善的形式是自明的，能为所有人直观顺利地理解，人们甚至不能理解已经窥得善的形式、真理的人的行动。从洞内到洞外的上升过程，从洞内人的角度来看也是“离群”的过程，用柏拉图自己的话来说，是“两眼适应和转换的过程”，不论是从洞内走到洞外、还是从洞外下到洞内，都会有“眼睛的混乱”（517a, 518a-518b），这种混乱，从洞内蒙昧者的角度对哲学家下到世俗生活造成了阻碍[[2]](#footnote-2)，但这种阻碍不足以和哲学生活的吸引力相比较：

凡是已经到达了那里的人，他们就不再愿意来处理有关人间的事了。而是，他们的灵魂总是倾向于和盼望着想要不断地停留和优游在这个高度上。（517d）

来自思维世界的吸引力，一方面使具有最好天性的哲学家远离可见世界和世俗生活[[3]](#footnote-3)，另一方面，又恰恰让他们成为掌管城邦的最好人选：既能把握真理和理智、够正确处理私人和公共事务，又漠视人世间的权力和利益。

二、哲学家为何要回到城邦？

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对掌管城邦经常持排斥而不屑一顾的态度，另一方面，柏拉图也认为，哲学家的福祉和公众的、城邦的福祉之间是同一的（497a）。尽管哲学家在追求真和善的道路上无暇他顾也无需旁顾，但对超越了世俗生活的哲学家而言，在内心深处似乎还是具有对城邦的向往，而脱胎于健康的城邦生活与教育的哲学家，则背负着服务城邦的义务。

柏拉图在第六卷和第七卷中，分别讨论了“碰巧产生”的哲学家和“被有意引导”的哲学家，在两卷中，哲学家出现原因的不同也许构成了从第六卷到第七卷的一个递进关系：哲学家的产生是艰难的，一度是偶然的，需要特殊的境遇，而理想的城邦要求哲人的“绘制”，因而需要从城邦中培育这样的哲学家。第七卷中，在城邦里受到精心的培养和引导，成长为哲学家的人，城邦对其有养育之恩，故而他们对城邦负有报偿的义务（520b-520c），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是对“正义的人下达的正义的命令”（520d）。

而第六卷（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所说的，是在正式的城邦和世俗生活之外成长的哲学家，他们因各种原因（被逐、生病）远离城邦生活而保有天性的清明，或者因天性鄙薄城邦事务和世俗行业走向哲学，在混乱的城邦政治中全身而退，但无法达成“最大的成就”。（496b-497b）这一段对话的前半部分和洞穴寓言所譬喻的现实有相似之处，而后半部分所说的“最大的成就”是指这些偶然成长起来的人，在城邦中“既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他人”（496d），也就是统治城邦。但另一方面，这一“成就”和整个城邦的善好（柏拉图在第七卷安排哲学家统治城邦的依据）读起来并不是一个东西，因为“成就”所带来的益处既指向了哲学家，也指向了公众（城邦）。所以，可以对柏拉图讨论的哲学家进行区分，一类是碰巧产生的，而另一类是被有意导向哲学生活中的。而碰巧产生的哲学家，他们同样需要通过城邦来达到最大的善好，但城邦并未养育他们，引导他们过上哲思的生活，这是两种哲学家不同的地方。这种比较，是否说明无论哲学家是否出于城邦的引导，他们对改善城邦政制、达成善好，至少在内心深处负有同样的感情上的驱力，因而除开柏拉图在第七卷中为哲学家重新下到世俗生活所陈述的理由外，还有其他的原因？

问题似乎可以这样表述：哲学家是否以城邦为手段？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紧张，仅仅是“水手”对真正善于航行的人的提防，哲学家如果不是受到城邦的培养，就不必被迫统治城邦；还是说，哲学家对城邦是抱有感情（无法忍受比他差的人进行统治）、抑或是需要城邦来完成他对善好的追求的？

1. \* 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

   “在这个居处中的火焰的光亮，要把它比作是太阳的能力和作用”（517b-517c）。 [↑](#footnote-ref-1)
2. 这种阻碍甚至可能威胁到哲学家的生命。“而谁如果试图去解脱他们并且引导他们向上走，那就只要有人能够把他（哲学家）弄到手并且能够杀死他，他们就会把他杀死的”（517a，括号内容是自己加的。）但这种极端的反抗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洞穴寓言中所描述的上升之路的痛苦，似乎并不足以构成人们杀死哲学家的动机。考虑到船喻中对税收的描述，也许政治是主要原因。 [↑](#footnote-ref-2)
3. **可能柏拉图正是想要引申出这一点，才用洞穴寓言隐喻哲学家和城邦之间的关系**。在第六卷中，太阳喻和线段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明晰，特别对善的讨论一部分被留到了后文（509a），洞穴寓言是对善的形式和思辨活动在各自领域的最高性的进一步说明，而这种最高性在第六卷中已经指明了。洞穴寓言将对真理和理智的把握与哲学家对思维世界的探索结合起来，想要从可见世界到可知世界的角度，说明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明智”）与城邦众人之间的紧张？ [↑](#footnote-ref-3)